

国外社会科学 资料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译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2 024 8391 8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译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无锡日报印刷厂印刷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工本费 0.90元

编 者 的 话

为了纪念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们集辑了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些论文，编成这本译文集。

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威望的提高不是偶然的。它是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中的指针，也是科学技术革命引起深刻社会政治变化和现代生活特点的必然结果。如恩格斯说的，马克思是“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呈现了一些新的、复杂的情况，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政党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试图运用马克思的某些理论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解释；一部分知识分子则竞相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他们从各自的立场研究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不同的以至互相抵触的见解，形成了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往往脱离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作纯理论的阐发。他们有的随意断定马克思是某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后继者，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有的认为马克思理论发展过程出现了“中断”，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试图把当代的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潮“补充”、“结合”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一门纯理性科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

2605/28

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恩格斯的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的学说是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的，站在资产阶级思想立场的人们不可能全部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内容。

但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不乏严肃的学者，他们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业，从事专题论著。他们企图不是教条主义地而是用马克思的精神解释资本主义的变化，提出新的观点，并对马克思的著作提出种种他们认为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些观点和问题，有的无疑是错误的，有的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去正确分析当代世界，则是有所裨益的。

这本译文集着重反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中的伟大现实意义，介绍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提出的各种新观点和新问题。

编入集子的论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当前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解释，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的关系；第二部分——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阐发和论述；第三部分——《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情况 and 研究；第四部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讨论；第五部分——介绍几本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新著。

鉴于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即将来临，《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从1982年7月号起即开始陆续刊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关论文，以便及时地提供国内学术界研究参考。译文集同时选编了其中部分论文，选入前经译者重新校订补充。

1983年2月

目 录

当代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解释

..... [英] T. 博托莫 (1)

马克思的辩证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 [加拿大] B. 阿格尔 (23)

卡尔·马克思：社会思想的面面观及其与当代的关系

..... [美] I. 蔡特林 (40)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美] R. 塔克 (56)

马克思论思想..... [美] P. 凯恩 (81)

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的看法..... C. 叶苏丁 (96)

马克思危机理论中的一般与特殊

..... [加拿大] M. 莱博维茨 (103)

马克思恩格斯论共产主义制度下民族的未来

..... M. 洛伊 (120)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批注影印本出版

和马克思研究的发展..... [日] 田中菊次 (133)

《资本论》中的社会主义..... [日] 不破哲三 (146)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

到《资本论》..... [法] M. 萨尼奥尔 (159)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 [美] P. 米克赛恩斯 (173)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新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 N. 普兰查斯 (199)

伊格尔顿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英] I. 伯查尔 (218)

马歇雷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 [英] T. 伊格尔顿 (227)

介绍几本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新著……………

…………… [英] D. 麦克莱伦 (237)

附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著索引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246)

当代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解释

[英] T·博托莫

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呈现出明显复兴的趋势，种种新颖的说法和对这门理论的批判性的重新评价也大量涌现。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经历了萧条、法西斯主义兴起、斯大林主义专政、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社会政策的重新定向、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及新兴独立国家的出现等一系列事件，全世界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以及国际关系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不同解释正是由此而产生的。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主义政权劣迹的揭露以及1956年东欧的叛乱，“正统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衰退了，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复苏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动乱导致了六十年代国际范围内的新激进派运动，这类运动支持了那种比较具有批判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兴。但是，这类激进派运动，以及知识界的重新觉醒，并不仅仅是对东欧事件的反响。它们也反映了三十年代以来世界社会形势的上述变化，而且激进派人士和重新觉醒的知识分子所探讨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大型跨国公司资本集中不断加剧的问题；新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出现；随着“干涉主义国家”的发展，国家权力和官僚行政有了增长；在阶级结构和各个阶级的政治倾向方面的变化；在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极权制”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趋势，这在

斯大林主义中表现得很明显，但又不仅限于斯大林主义。其实，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已探讨过其中的许多问题，因此毫不奇怪，最近这种复苏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布尔什维克独霸时期所扼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式加以重新发现，并且加以推广（尤其是在讲英语的地区，那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过去是极不时兴的）；这种被重新发现和得到推广的思潮就是科尔施和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

在最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表述中，可以鉴别出两种多少有些对立的主要思潮。第一种思潮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道主义、民主或解放的内容，而第二种思潮则着重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质，力图得出不同的概念图式和作为其基础的认识论。为方便起见，我对这两种解释分别称之为“人道主义的”解释和“科学的”解释。这两种解释大部分都是与斯大林主义时代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的，虽然两者的着眼点很不相同：前者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其指导的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非人道的、独裁的倾向，后者则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肤浅教条的理论立场。

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一向具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它的一般特点是十分注重个人和集团的自觉行动，注重文化的研究与历史的解释，而不注重对经济结构和过程的分析。这种倾向的最早的表现可以见之于科尔施和卢卡奇的著述中；许多批评家都认为，他们两个人在把马克思的思想重新黑格尔化方面起了首创作用，这种做法在六十年代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可能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此两部著作均于1923

年发表)中把黑格尔关于“总体性”^①之类的独特概念重新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广泛地说,则是把马克思主义描述成了一种与历史形势和无产阶级作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历史哲学,而不是看成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科尔施,他论证说,作为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哲学,它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就如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一样^②。

科尔施和卢卡奇两人对于创建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的组织基础)都起了作用。他们参与了1922年夏季举行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的活动,在那里首次提出了建立研究所的设想,但这次会议的大量时间是用于讨论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手稿^③。很显然,法兰克福学派某些主要成

①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第27页上写道:“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差别并不是在历史说明中把经济动因放在首位,而是总体性观点。总体性范畴,整体对部分的全面支配的至上地位,是马克思得之于黑格尔的方法的实质,马克思把这种方法出色地改造成了一种全新科学的基础”。与此相类似,科尔施也谈到“历史社会过程的总体性”,并且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可以看成和理解为活生生的总体性的社会发展的理论;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是关于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总体性被理解和被实践的社会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52页)。

②科尔施后来改变了看法,驳斥了他所认为的“对唯物主义原理的强烈经验意义和批判意义的曲解”,也批驳了把马克思主义制订为“关于宇宙的一般哲学解释”的做法。他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趋势不再是哲学的趋势,而是经验科学方法的趋势”(《卡尔·马克思》,1967年德文修订版,第203页)。

③要了解此事的详细情况,可参看马丁·杰《辩证的想象》一书的第1章。

员的见解，自始至终都非常接近于科尔施和卢卡奇的见解，特别明显的表现是他们强调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根源，尤其是强调马克思思想同黑格尔辩证法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关系。例如，在豪克海默1937年发表的关于批判理论^①的一些文章中，以及在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1941）一书中，这一点都表现得很明显。不过，在科尔施、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之间仍然有重大的差别。前两人在政治生活中很活跃（1923年两人都是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卢卡奇除了1957—1969年这段时期以外，一生中的其他全部时间都始终是一名党员），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功能是由革命政党来执行的一种职能。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设想为“革命过程本身在思想上的表现”，而且一直大谈什么“无产阶级的正确的阶级意识及其组织形式即共产党”。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则都远离政治活动^②，他们认为，发扬马克思社会学说中所体现的批判理性，不是某个政党或某个政治运动的任务，而是某个知识分子集团的责任，正如利希特海姆所指出，这种看法与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批判家”的见解不无相似之处^③。

①“批判理论”这个术语已成为概括说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一个通用语，虽然它或许特别是指该学派成员的后期观点，同时也是指那些严格说来并非该派成员的思想家的见解。

②见马丁·杰：《辩证的想象》，第13—15页。

③利希特海姆：《从马克思到黑格尔》。在较晚期，这种观点在马尔库塞《单面的人》这部著作的带有悲观色彩的结论部分表现得最为充分，在那里，这位批判的思想家好象一个孤独的个人，在技术合理性的洪流中无望地挣扎，随波逐流，批判的社会理论不再在社会中寻找那种追求更合理更自由的制度的“现实力量”，而批判理论也就“不能把它的合理性变成历史实践的事项”。

这种差别在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科尔施和卢卡奇持有似乎一贯正确的观点，认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可以通过革命的政党或运动来达到，并且据说他们自己已经实现了这种统一；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则从纯理论的角度表示了对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看法，他们不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提不出任何能使理论和实践正确有效地彼此联系起来的方法。我认为，部分地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这些思想家的许多后期著述以专门探讨知识和文化的发展为特点，对经济现象、尤其是政治现象则不够注意^①。

但是，这并不是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总括为这样一个结论：科尔施和卢卡奇所采取的立场是一贯的、正确的，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则是不一贯的、错误的。问题比这要复杂一些。首先，可以看出，在欧洲战后革命运动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科尔施和卢卡奇两人都效忠于这样一个政党，这个党最后终于证明不是一个解放的力量，反而是新专制国家的工具。第二，这种效忠的根据，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能够由辩证理性确认的历史过程的主体的这种观念（所谓辩证理性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据说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过程本身在思想上的唯一表现，或者换句话说，是历史过程主体的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意识），促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变为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如科尔施本人后来所承认）排除了马克思本人思想中那些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经验的（因而是可以校正的）社会科学性质的因素。在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虽然也把马克思

^①要了解以这种观点对阿多尔诺的某些评论，可参看G·罗斯《令人伤感的科学：对阿多尔诺思想的评介》一书的第7章。

主义看作批判的理性，并以此观念为依据来发挥他们的思想，但他们却比较正视理性的论断（如他们所理解的）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和趋势互相脱节的现象，在这方面，西方工人阶级没有革命性的看法与实践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是更加“批判的”，他们与现存政党和运动相脱离的做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承认事情的实际情况与批判理性的判断之间的这种脱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来看仍然是件矛盾的事情，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它的独到之处正是在于它能克服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的二元论^①。

摆脱这种矛盾局面的一个出路，当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不适应新历史形势的东西而加以抛弃，再去寻求另外一种形式的批判理论。看来不仅是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批判理论家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科尔施也选择了这条道路，他在生命接近终结时在《关于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十个论题》（1950年）中写道：“想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其根本功能上重建为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理论的一切企图都是反动的空想”，然后他又大谈可以用一种新形式来“重建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但科尔施没有作出任何提示，表明这种做法该如何进行，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可能包含哪些内容，或者这种内容是否符合时代的社会现实。在这方面，他的想法同近二十年来的许多激进派人士的想法类似，在这些人看来，“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只不过是一种信条而已。

但是，显然还有另一种摆脱这种矛盾局面的出路。这就是要承认事实 and 价值的二元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既有关于社

^①可特别参看卢西安·哥尔德曼《马克思早期著述中的哲学与社会学》一文对这种独到性的论述。我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书的第4章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考察。

会的科学(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又有规范性的社会理论(对确定的价值和目标的主张和论证),这两者有区别,但也有联系。按着这些思路,我在别的文章中曾经论证道:“……马克思在世时,他的理论分析和他对劳工运动的忠诚是一致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马克思的理论能够得到经验的确证,而经验的试验同时又从理性上和事实上给马克思的道德信念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支持”①。许多近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象某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样,已经广泛地按这种方式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解释②,而他们各自在说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时,或者尤其是在说明理论分析和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时,彼此又有很大的分歧;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者是由于他们主要致力于修正和发展关于社会的科学,或者是由于他们主要致力于对规范性的问题进行哲学的探讨。

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种种见解。作为近期人道主义思潮的基础的许多主要概念已经不再是“历史总体性”或特许“历史主体”(工人阶级)这类概念,而是“人性”和“人的需要”这些概念。例如,在1965年发表的一部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③为标题的重要论文集中和在南斯拉夫的《实践》杂志(这是1964—1974年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

①博托莫:《作为社会批判的社会学》,英文版,第83页。

②这里值得指出,卢西安·哥尔德曼尽管强烈地维护那种声称要克服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的辩证学说,他本人也还是向对立的观点作出了某些让步。

③E·弗罗姆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论文集。

文发行并出有国际版的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之一)①的总倾向中,这种情况表现得十分明显。实践派所关心的问题不是要创立一种能从其中立即引伸出价值观念的关于人性的经验科学,而是要发展一种规范性的理论,特别是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以便能把作为政治决策目标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明确陈述出来。同样,《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论文集的撰稿人之一的马列克·弗里茨汉德也阐述了马克思的标准的“人的理想”,其中他区分了三种相互联系的概念:“完全的”而不是片断或局限的人的概念;“协调的个人”的概念;“自由行动的”、有创造力的个人的概念②。

在近期的某些“批判理论家”的见解中,也表现出一种类似的二元论,虽然表现得不大明显。例如,哈贝马斯在从认识论上批判实证主义时,分别提出了人的三种“认识兴趣”(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是“人性”的组成部分):表现为科学知识的对技术控制的兴趣;表现为注释学知识的对社会相互作用

①关于《实践》杂志的历史以及它所倡导的哲学和社会学的辩论, M·马尔科维奇的《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一文中简要的说明,可参看马尔科维奇与R·S·科恩合著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兴衰》一书的第一部分。也可参看马尔科维奇与G·彼得洛维奇合编的《实践:南斯拉夫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文集》。南斯拉夫思想家为这些主题所撰写的文章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些文章对一个正在运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问题、需要和机会提出了严肃的批判的见解,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到今天,这个社会都是适用于将来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具有吸引力的模式。这并不是说,它是一个绝对完善的模式;《实践》杂志由于对重要政治领导人及官僚分子持批判的态度,于1974年被责令停刊,它本身的命运表明,民主和自治在南斯拉夫仍远未获得安全的保障。

②见弗罗姆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英文版,第157—165页。

和自我理解的兴趣；设想为以某种方式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结合在一起的“解放”兴趣。当然，哈贝马斯在论述这种解放兴趣时表明，他的分析是想要导致一种一元论的而非二元论的观念；但是，理性的这种统一是否能令人信服地确立，仍然是值得怀疑的。科拉科夫斯基在一段评论^①中指出：“哈贝马斯没有对他所谓的‘解放’的主要概念下明确的定义。很明显，他是按照德国唯心主义的整个传统的精神，来寻求一个焦点，把实践的理性与理论的理性、认识与意愿、关于世界的知识与改变世界的运动统统结合在一起。但好象他并没有确实找到这样一个焦点，或者告诉我们怎样去达到这个焦点，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个人或社会的自我理解行动本身就是导致‘解放’（不管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的实际行为的一部分。不过问题还始终存在：我们按照什么标准去判断这种自我理解的准确程度，我们依据什么原则去决定这种‘解放’存在于一种事态中而不是存在于另一种事态中？在第二个问题上，我们无可避免地要做出超乎我们对世界的知识之外的决定”。

可见，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的论证，似乎不如把二者作为不同的理性形式分离开那样论证得成功。另一位深受哈贝马斯影响的批判理论家也含蓄地承认这种区别，他写道：“为了重新表述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的设想，就必须在表述中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伦理和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子宫中‘孕育’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的‘社会主义觉悟’”。^②

上述作家所表达的二元论，并不一定是要在事实和价值这

①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3卷，第387—395页。

②A·维尔默：《批判的社会理论》，第121—122页。

两个领域之间设立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不是要断定理性的活动只局限于事实领域，而意愿或“决断论”（‘decisionism’——借用哈贝马斯用来说明马克斯·维贝尔立场的一个词）则通行于价值领域。他们当中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在实际活动的领域中，理性是、而且只能是“感情的奴仆”。他们的主旨倒是要划分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适当领域和方法，决定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特别是在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中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哈贝马斯阐述了一种关于理性的本质统一的见解，但我认为，这充其量不过是略微谈到了他所区分的几种理性形式的关联性。看来这种解释在哈贝马斯本人对他自己论点的某些阐述中也找到了依据，例如在《合法性危机》（第10页）中他写道：“与我们在经验论述中所提出的真理性主张相符合的，是我们按行动和评价的标准所提出的关于正确性或适用性的主张”。

另一方面，南斯拉夫的思想家们则更加充分地承认，理性有各种不同的、不可还原的（但并非没有联系的）形式；在不同的领域中，理性的实现过程也各不相同；理性的作用和有效性在某些领域中也许比在另一些领域中更受到限制；由于他们怀有这种看法，所以他们比较倾向于把社会科学、价值哲学和科学哲学各自的特殊问题当作分离的和不同的论题来加以阐明。从马尔科维奇关于实践派研究纲领的说明中所摘引的下面这段话，清楚地表现了这种趋向：“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生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却发生在东方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对这个事实该怎样解释呢？在一场明显的革命以后居然能产生一个官僚制的社会，那么革命究竟是什么？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中怎样建立起社会主义？消除国家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实行非市场的现代经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伦理学和美